

ZAI ZIBENJIA DE XIAOLIAN HOUMIAN



在资本家的笑脸后面

在资本家的笑脸后面

赵隆义插图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85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2印张 28千字

1964年4月北京第1版 1964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150,001—250,000 定价(3)0.15元

告少年讀者

亲爱的少年朋友，你生在新社会，长在紅旗下，恐怕还不知道旧社会是什么样子吧？

旧社会是剝削階級剝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社会。旧社会有哪些剝削階級？剝削階級怎样剝削和压迫劳动人民？剝削階級为什么能剝削和压迫劳动人民？这些，你一定很想知道吧？我們打算編一套書，来給大家講講这些事情。

这套書共有八本，其中四本是通过真实的故事來說明問題的。这四本書的書名是：《万恶的地主階級》《禍国殃民的蔣家王朝》《罪恶滔天的帝国主义》和《榨取工人血汗的資本家》。另外四本，是揭露剝削階級剝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真实故事，是前四本的輔助讀物。

这一本《在資本家的笑脸后面》，就是《榨取工人血汗的資本家》的輔助讀物。你看了《榨取工人血汗的資本家》，再看看这本书，就会进一步了解資產階級的丑恶本質。同时，你把新社会和旧社会做个对比，就会更加热爱社会主义，更加热爱共产党，更加热爱毛主席！

編者

1963年12月

目 次

人間地獄	张文升 刘振华	5
包身工的苦难	王緒生	10
徒工泪	多兴云	19
鞋的故事	张緒波	24
女工苦	祝生秀	28
我的遭遇	张紹琴	32
在資本家的笑脸后面	紀 哲	36
一个电工的惨死	唐殿元	42
十四条人命	何福仁	48
不同的晚年	周阿巧	51
王子哲的发家史	霍 斌	55
苦难中的斗争		59



告少年讀者

親愛的少年朋友，你生在新社會，長在紅旗下，恐怕還不知道舊社會是什麼樣子吧？

舊社會是剝削階級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的社會。舊社會有哪些剝削階級？剝削階級怎樣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？剝削階級為什麼能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？這些，你一定很想知道吧？我們打算編一套書，來給大家講講這些事情。

這套書共有八本，其中四本是通過真實的故事來說明問題的。這四本書的書名是：《萬惡的地主階級》《禍國殃民的蔣家王朝》《罪惡滔天的帝國主義》和《榨取工人血汗的資本家》。另外四本，是揭露剝削階級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的真實故事，是前四本的輔助讀物。

這一本《在資本家的笑臉後面》，就是《榨取工人血汗的資本家》的輔助讀物。你看了《榨取工人血汗的資本家》，再看看這本書，就會進一步了解資產階級的丑惡本質。同時，你把新社會和舊社會做個對比，就會更加熱愛社會主義，更加熱愛共產黨，更加熱愛毛主席！

編者

1963年12月



目 次

人間地獄	张文升 刘振华	5
包身工的苦难	王緒生	10
徒工泪	多兴云	19
鞋的故事	张緒波	24
女工苦	祝生秀	28
我的遭遇	张紹琴	32
在資本家的笑脸后面	紀 哲	36
一个电工的惨死	唐殿元	42
十四条人命	何福仁	48
不同的晚年	周阿巧	51
王子哲的发家史	霍 斌	55
苦难中的斗争		59



人間地獄

解放前，天津有一个裕大紗厂。这个厂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、大汉奸王克敏开的。王克敏为了更多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，派狗腿子王相林到河南、河北和北京等地方，招收了很多十几岁的孩子当童工。

那一年，我刚十二岁，整天跟着媽媽在村里要飯。媽媽听說来了招工的，又管吃又管穿，就把我托給了招工的。不多日子，我、我表弟和村里好些穷人家的孩子一起到了天津。听說那一回王相林一共招了八百多个孩子。

进厂以后，我們被交給了工头朱胖子。朱胖子手里提着一根上头粗下头細、头上有一个銅疙瘩〔gē da〕的棍子，他把眼一瞪，恶声恶气地要我們排好队，在“志願書”上按手印，然后換上一身灰衣褲。連休息也不讓休息，就押着我們上工去了。

每天天不亮，汽笛就像鬼叫似的催我們起床。我們一天要做十几个小时工，累得总是睡不够，常常听不見汽笛叫。这时候，朱胖子偷偷走进来，把我們从被窝里一个一个揪出来，劈头盖脸地一顿打，一面打，一面問：“吃‘片湯’（板子），还是吃‘面条’（棍子）？”話音刚落，就进来两个工头，給我們每人四十棍子，痛得我們“媽呀，媽呀”直叫喚。打过



了,还要我們跪在砖头上,直到上工的汽笛响了,才赶着我們去上工。

这样的折磨,十几岁的孩子怎么受得了呢!我們天天想家,想慈爱的父母,誰都想逃出去。可是,我們住在厂里,从来不許出門,連大門朝哪里开也不知道,怎么逃得掉呢?

一天夜里,外面靜悄悄的。童工刘小宝哭着对一个小伙伴說:“咱們跑吧!”

小伙伴說:“围墙这么高,怎么爬得出去呢?”

他俩想呀,想呀,后来那个小伙伴說:“你踏着我的肩膀爬出去吧!”

刘小宝看了看小伙伴,說:“那你呢?”

“我再想办法。快点,一会儿朱胖子来啦。”

他們俩摸到了围墙根。刘小宝踏着小伙伴的肩膀,翻过围墙逃跑了。

刘小宝跑出来以后,还没有走过几条街,就給警察看見



了。警察見刘小宝穿着裕大紗厂的灰布衣服，就知道他是偷跑出来的，馬上把他抓住押回紗厂。

朱胖子見了刘小宝，两眼一瞪，立刻叫人把他吊在树上，抡起板子，劈劈啪啪毒打了四十下，打得刘小宝死去活来。

刘小宝挨了这頓毒打，不能起床，沒有飯吃。有一天，同屋的一个小伙伴，偷偷給他拿了块醇醇[bō]，不料給朱胖子看見了。朱胖子一把把他抓过去，瞪着贼眼說：“好呀！你是連吃帶偷，今天我讓你吃个够！”說完，就叫了两个工头，一个按着那童工的头，一个按着腿，他上去就是一頓狠打，打得那童工爹呀媽呀直叫。从此，朱胖子便規定，童工們吃过飯以后要挨个儿搜[sōu]身。

不久，刘小宝就給送进“八間房”去了。送进“八間房”就是活活等死呀！

“八間房”在工厂右边的一个小院里，东边四間，西边四間。院子里长滿了野草，阴森森的，真叫人害怕。房子里只有几块破板子搭的床，别的什么也沒有。誰要是給送进了“八間房”，就是不病死，也得餓死。死了就被抬到一块叫“艺徒坟地”的乱葬崗上埋掉。每天都要从“八間房”里抬出去几个死孩子。童工“犯”了法要給送进“八間房”，要是生了病，病倒了，也要給送进“八間房”。所以大伙儿都提心吊胆，怕工头找碴儿，也怕生病。

可是，长期过着又累又苦的生活，誰能保住不生病呢？果然，我的表弟生了脓疱疮，滿身是白泡，痒得厉害，一抓就

流黄水，黄水流到哪儿，就烂到哪儿，后来烂了一脸一身，就病倒了。我和表弟盖一床被，我也传染上了。我们两个人躺在潮湿的工房里，没有东西吃，又饿又害怕。

那晓得没躺上几天，朱胖子带着人进来了，我们吓得像傻子一样，浑身直打哆嗦，说不出一句话。只听朱胖子对跟着的人说：“看样子一半天干不了活，干脆，送‘八间房’算啦！”

他刚说完，就过来两个人，要把我和表弟抬走。我吓得苦苦哀求，可朱胖子像没有听见一样。

这时候，站在朱胖子旁边的一个人指着我说：“朱先生，这个孩子病轻，让他留两天看看吧。”



朱胖子就叫人把我表弟拖走。表弟挣扎着说：“朱先生，我还能活，别……送啦，行行……行行好吧。”朱胖子连理也不理，叫人把他抬走了。我望着表弟两只手在空中乱舞乱抓，哭着喊着被抬出工房，心像刀扎了似的，也禁不住哭起来了。

从那以后，我再



沒有見到表弟。他和所有被抬進“八間房”的童工一樣，也連病帶餓，活活地被折磨死了。

不到三年，我們一起來的八百多個童工，就這樣被折磨死了五百多個！

這些孩子的父母，在家里天天盼，年年盼，盼望着自己的孩子早些回來。盼了好幾年，沒有一點音訊，有的就向地主借了高利貸[dài]，或者賣了東西趕到紗廠來看孩子。要跑好幾趟，才能見到王相林。見了面，他只淡淡地給一句話：“走吧，你孩子得病死了。”

活生生的孩子，這麼不明不白地死了，做父母的哪有不傷心的。可是，那年月，是剝削階級橫行的天下，到哪里去訴苦，到哪里去申冤啊！

解放以後，“八間房”拆了。在那塊地方，蓋起了我們棉紡三廠的俱樂部，“藝徒墳地”那塊地方，修起了第二工人文化宮。這些在舊社會里哭聲淒淒、陰風慘慘的地方，現在充滿了歡樂的歌聲、愉快的笑聲。但是，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這裡曾經埋葬過童工們的尸骨，永遠不會忘記資本家和他們的狗腿子怎樣折磨死了好幾百個童工！

國營天津棉紡三廠 張文升 劉振華

包身工的苦难

国营上海第十二棉纺织厂的潘年芳阿姨解放前做过包身工。这里讲的,是她和别的包身工的苦难。

潘年芳阿姨生长在江苏省泰州乡下,她家有八个人:爷爷、爸爸、妈妈,一个妹妹、三个弟弟和她一家这么多人要吃要穿,可只种着两亩祖宗留下来的坟地和向地主租来的三亩薄地。她爸爸白天给地主家推车挑担,晚上披星戴月下地干活。一年到头这么辛苦,到头来,交了地主的租,就剩不下几颗粮食,全家人还得挨饿。住的两间破草屋,墙是草泥糊的,门是蒲叶编的,四处透风;穿的盖的更不用说了,破破烂烂,遮不严盖不暖。

1934年夏天,潘年芳阿姨的家乡遭了大水,她们一家人有的爬在树上,有的坐在木盆里,过了七天七夜。她妈妈正怀着孩子,受了这番折磨,不久就死了。

遭了这一场天灾人祸,她家的日子更难过了。

有一天,村里来了个戴铜盆帽、穿绸长袍的陌生人。他说他是上海一家纱厂的带工老板,特地到农村来招工的。他见了人就說,“嘿,到上海做工可好啦,进大工厂,住洋房,吃白米饭……三年以后,工钱全归你们自己。”

大伙儿听得有点半信半疑。



有个人問他：“跟你去有啥規矩？”

他說：“吃包飯，听老板的話。沒別的。”

“一年給几个錢呢？”

“一年不包。要包得包三年。一年給十塊錢，先付五塊。怎么样？”

潘年芳阿姨的爸爸，看看倒塌的草房，看看一片水汪汪的庄稼地，又看看站在一旁的全家老少，心动了。他对那带工老板說：“先給五塊錢太少了，多一些吧！……”

带工老板冷冷地說：“那不行，說五塊就是五塊，規矩不能破。你家不願意去，拉倒，願意去的多着呢！”說着，他故意裝出立刻要走開的樣子。

这时候，站在旁边的十二岁的潘年芳着急了，她噙〔qin〕着眼泪，央求爸爸說：“爸，五塊就五塊，讓我去吧。有了这五塊錢，也好买点粮食活命呀！”爸爸用顫抖的手撫摸着年芳的头，眼泪落到了孩子的头上。

事情說妥当了，带工老板拿出一张包



身契〔qi〕，要潘年芳阿姨的爸爸在上面按手印。包身契上写着：在三年里面，潘年芳就是他带工老板的人了，不听话要由他打，由他骂，打死也不偿命。

等潘年芳阿姨的爸爸按了手印，带工老板掏出五块钱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现在小姑娘卖给我啦，钱收下吧。”

当天晚上，潘年芳阿姨和前村后村一共十个小姑娘，乘上船，由带工老板带走了。

潘年芳阿姨到了上海，开始过着又一种苦难的生活。

清晨五点鐘，她和一百多个农村姑娘站在紗厂围墙旁边等着工厂开门，登记上工。这一百多个姑娘和她一样，也是带工老板从农村买来的。

九点多鐘，厂门开了，开始写“号头”（就是登记做工）了。资本家的狗腿子，把她们当商品一样地挑来挑去。长得矮小的不要，太瘦的也不要。

潘年芳阿姨生得矮小，没有被挑上，只好回来了。她走到带工老板的家门口，老板娘见了她就问：“号头写上没有？”潘年芳阿姨胆怯地摇了摇头。老板娘抓起板凳，就朝她头上摔过去。板凳角砸破了潘年芳阿姨的头，顿时鲜血直流。

打一頓并没有了事。带工老板哪里会让一个花了五块钱买来的“活工具”白白吃闲饭呢。带工老板要她烧饭，洗衣服，拖地板……，稍稍不如意，就拳打脚踢。潘年芳阿姨的身上从来没断过伤。



后来，潘年芳阿姨又去登記上工，有人告訴她，踮起脚尖，看起來可以高一些。可憐，小小的潘年芳阿姨踮着脚尖足足等了三個小時，才寫上號頭。

就這樣，潘年芳阿姨當上了包身工。

包身工的生活，簡直不是人的生活啊！三十多個人，睡在一間七尺寬、十二尺長的閣樓上。寒冬臘月，四個人合蓋一條被子。每天清早，天還黑着呢，鈴聲一響，就有人吆喝着來催起床了。這時候，閣樓上立刻一陣騷動，包身工一個個急急忙忙地梳頭，梳辮子，把破被頭堆起來……。一會兒，二遍鈴又響了，一個小姑娘提來一桶碎米稀粥，端出一

只放着几片咸菜的粗碗。這就是早飯。於是，又是一陣騷動，碗筷碰擊聲，喝粥聲……。喝得快的，能喝上兩碗；喝得慢的，喝完一碗，桶里就完了。這麼稀的粥，就是喝上兩碗，也填不飽肚子啊。

吃過早飯，她們由帶工老板或者老板的狗腿子押着



到車間去干活。車間里，棉絮飛揚，蒸汽弥漫，空气很混浊，干不了多少时候，就会头昏脑胀，喘不过气来。工头們像餓狼一般整天在車間里走来走去，找碴儿打罵工人。厂里規定，吃飯不准关車。到了吃飯的时候，她們只好站在紡紗車旁边，一边工作，一边用手抓冷飯往嘴里塞。要上廁所大小便，还得領牌子。一个車間上百个人只有一块牌子，有时候半天也拿不到牌子。有的人实在憋不住了，只得尿在褲子里……。在这像監獄一般的車間里，她們每天要干十二小时的活。

晚上下了工，再由狗腿子把她們押回来。这时候，閣楼上常常发出“喔！痛呀，痛呀……”的叫声。这是包身工們在相互帮着脫衣服。原来每个人身上都有打伤的，或是被蚊子臭虫咬了抓破化脓的烂疮。衣服和伤口上的脓水粘住了，一脫就流血，痛得鑽心。

潘年芳阿姨和小姐妹們，天天都过着这样的生活。

第二年夏天，潘年芳阿姨脚心生了一个疮，紅凸凸的，肿得有两三岁孩子的拳头大。脚不能落地，带工老板还逼着她上工。

她拐着一条腿，来回走着看管紡紗車，一个不留神，紡紗車上的鉄棍碰着了烂疮，她痛得赶紧弯下腰，捂住伤口。这时候，正好一个狗腿子走过来，看她弯着腰，硬說她想把棉紗揣在怀里，說着朝她踢了三脚，还連連喊要开除她。

开除，可以离开这个地獄，这不正是潘年芳阿姨日夜盼望的嗎？可是她一想到带工老板凶狠的面孔，和攥[zuàn]



在手里的皮鞭，就害怕了。她想，若是被开除了，准会被带工老板打死。她吓得扑在地上哀求说：“求求你，行行好，不要开除我，我是包身工啊！”

狗腿子“哼哼！”冷笑了两声，叫人把一隻方凳朝天放倒，要潘年芳阿姨把两只手和两个膝盖抵在四只凳脚上，脸朝地趴着，叫她趴了足足三个小时。

牛馬一般的生活，泥土一般的被踐踏，許多包身工被折磨成皮包骨头。有的患脑膜炎等急病死了，有的害瘧疾〔瘧nüè〕病死了，有的泻肚子死了，还有的被活活打死了。

潘年芳阿姨永远也不会忘記，她的同村姐妹陈桂英是怎样死的。

陈桂英是潘年芳阿姨的邻居。小时候，她俩在一起背着籃子割草，在一起玩耍。来到这吃人的地方以后，她俩又睡在一个被窝里。第二年，陈桂英得了黄疸病，渾身沒有力气，連走路都很吃力。

有一天，陈桂英喘着气哀求带工老板说：“今天实在做不动了，求你讓我歇一天吧。”

带工老板随手朝陈桂英头上啪啪啪打了三巴掌。陈桂英被打得倒在地上，禁不住大哭起来。

在这吃人的地方，大声哭就是一种反抗的行为。带工老板抖动滿脸橫肉，大声吼着罵：“賤骨头！你敢哭，看你有本事！”

他向旁边的狗腿子丢了一个眼色，狗腿子就綁起陈桂



英吊在梁上，又抓来一只猫，塞进她裤子里，扎紧裤脚管，然后用皮鞭朝她身上打。鞭子一抽，那猫就在里面乱跳乱抓。陈桂英痛得把喉咙都喊哑了，狗腿子还是不停地打。打陈桂英的时候，带工老板还逼着所有的包身工在旁边看，威吓

大家。一直折磨了三刻钟，才把陈桂英放下来。

陈桂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，姐妹们把她搀到阁楼上，已经不省人事了。从那以后，好几天，她一直躺在那里闭着眼睛，不哼一声，也不肯喝一口水，只是紧紧攥着两只拳头。

潘年芳阿姨下工回来，偷偷盛了半碗稀粥，端到她面前，噙着眼泪说：“桂英姐，喝一口粥汤吧……”

陈桂英的嘴唇动了几下，想说什么，话没说出来，眼泪却涌了出来。她挣扎着，睁开失神的眼睛，猛地攥住潘年芳阿姨的手，哆嗦着说：“兰英（潘年芳阿姨的小名），你要替我出这口气啊！你对我爸爸说，要给我报仇啊！……”倔强的陈桂英，话没说完，就倒在潘年芳阿姨怀里，咽了最后一



口气。

包身工的日子是这样难过难熬，有的包身工也想到过逃走。但是狗腿子看管得很严，没有一个人能逃出他们的魔掌。有一个姓蔡的十一岁的小姑娘，有一次逃出来，已经搭上回家的小轮船了，结果还是给狗腿子赶到拖了回去。狗腿子把她关在一间空房子里，用布头塞住她的嘴，朝她身上乱打。从此，小姐妹们就没有再看见她。后来有人传出来，说她被打死，给偷偷地埋了。

潘年芳阿姨在这个吃人的地狱里，好容易熬过了三年。三年包身期满了，可是带工老板想出种种借口，硬逼着潘年芳阿姨多做一年。到第五年，她才脱离了带工老板的魔掌。

可是，在万恶的旧社会里，一个工人，跳出这一个带工老板的魔掌，却跳不出另一个老板的魔掌。到哪一个资本家的手下做工，都是一样受罪。

因为长年累月的劳累、受折磨，解放前夕，潘年芳阿姨还不到三十岁，已经浑身是病；长了十多年的痔疮，没钱治，整天流脓流血，走起路来不能跨大步；还害了血吸虫病，肚子大得怕人，白天，她一步一挪地去上工；晚上，由丈夫背到家里。

潘年芳阿姨以为她这一生除了受苦再没有过幸福日子的希望了。想不到1949年5月，上海解放了！工人翻了身，做了国家的主人。潘年芳阿姨的苦难也从此结束了。就在解放那一年，党组织送她到医院去治病，给她治好了痔疮和血吸虫病。

她丈夫在旧社会长期沒有工作，組織上給他安排了工作。解放以后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使潘年芳阿姨深深地知道，沒有共产党，工人阶级决不可能翻身作国家的主人。她决心把她的全部精力用来建設社会主义。1959年9月底，她入了党。現在，她是老工人講師团的講師，常常到工厂、农村、部队、学校、商店去作报告，把自己在旧社会亲身受到的苦难，告訴年青的一代，使大家認識剝削阶级的罪恶，要大家不要忘記阶级斗争，不要忘記过去，珍惜新社会的美好生活。

王緒生



徒 工 泪

1942年，我十二岁，跟着十七岁的大哥逃荒到了天津。大哥拉洋车，我卖饅[guǒ]子(就是油条)。我們哥儿俩飢一頓飽一頓地过着日子。

到我十六岁那年，哥哥托人把我送到大王庄来兴豆腐坊当了徒工。当时我心里想：有了事干，再不会挨餓了。誰知道出了“鬼門关”，却进了“閻王殿”。在旧社会哪有我們穷人的活路！

我在来兴豆腐坊，每天从早晨五点，一直要干到晚上八九点鐘，忙得連喘口气的工夫都沒有。

进店沒几天，內掌柜的把我叫到她跟前，尖着嗓子对我說：“鋪子里沒有活儿就給我抱孩子。不准閑着！孩子要哭一声，我要你的小命！”說着，随手就把孩子递[di]給我。那孩子长得肥头大耳，沉甸甸的，抱一会儿，就累得我两臂痠疼。抱着还不行，还得一股劲地抖动，不然，孩子就連哭帶鬧地抓我的臉。我真难过极了。想起自己，四五岁就下地拔草、打柴、采野菜，可是有錢人的少爷，成天得有人抱着，哄着。天底下的事怎么这样不公平啊！

繁重的活儿，做不完的杂事，把我折磨得面黃肌瘦，身子十分虛弱。我生怕得病，因为得了病，掌柜的知道了，馬

上就要叫你卷鋪盖滾蛋。

可是，人哪能免得了个三病两痛呢。第二年八月里，我害了瘧疾病，生怕叫掌柜的知道，就咬紧牙关硬頂着干活。拖到第八天，实在支持不住了。早晨我掙扎着起来，可是軟弱无力的身子不听使喚，两只胳膊使劲支撐，刚抬起身子，就眼睛发黑，直冒金星。折腾了一陣子，迷迷糊糊地暈[yūn]了过去。

朦朧中，听到掌柜的在喊：“小二怎么还没起呀？”一个师傅告訴他，我得了瘧疾。掌柜的冷笑着說：“这点小病，就装上蒜啦！有口气就得給我起来干活！”



我东倒西歪地下了吊鋪。掌柜的一看我病得不輕，就沉下脸，冷冰冰地說：“回家去养着吧，我这里不养閑人！”說着，把我那床小被扔給我，硬把我轟出了店門。

就这样，我拖着带病的身子，提着小鋪盖卷，含着两眶眼泪，离开了米兴豆腐坊。



在这个豆腐坊里，我給掌柜的白白卖了两年命，除去每天吃三頓窝头，經常挨罵受气以外，什么也沒得到。

离开来兴豆腐坊不久，我扛着小鋪盖卷，进了河南路起发順饅子鋪。

一进门，掌柜的就对我說：“我这儿人多地方小，鋪板都叫师傅們占了，你就睡在地上吧。”为了找碗飯吃，还講什么条件，我点头答应了。

夜里，我躺在冰冷的洋灰地上。我那床破烂的小棉被，顧了垫就顧不上盖。我只好弯着身子，像对虾一样縮在小被里发抖。

我的旁边，有一个油漆木板搭的狗窝。掌柜的怕狗冷，还給鋪上了軟綿綿的小棉褥[rù]。

人睡的地方不如狗，人吃的东西也不如狗。掌柜的給我吃的是棒子面窝窝头，給狗吃的却是白面烧餅。

一天，掌柜的对我说：“小二，喂狗的



事以后交给你了。狗不吃烧餅皮，皮子归你吃；可不許你吃瓢[ráng]子！”从此，我每天要喂它三四次。狗吃烧餅瓢，我吃烧餅皮。

有一次，我把烧餅瓢扔給狗。狗只聞了一陣就走开了。掌柜的馬上說：“小二，你把它吃嘍，扔掉怪可惜的。”

我不高兴地說：“狗聞了半天，怪脏的。怎么吃呀！”

掌柜的把臉一沉，眼珠子瞪得老大，說：“你真他媽的討飯花子摔罐子——較穷劲儿，吃飽了不認識大鉄勺哪！”說着，啪啪打了我两面棍。

有一次，我請假去看老乡，回来晚了。掌柜的不給開門，只听他在屋里嚷道：“不許給他開門，回来这么晚，在外边冻他个土蛋！……”我身上衣服又薄又破，哪能抵得住冬夜的严寒！我真恨极了，想狠狠地大罵一通，离开这鬼地方。可又一想，离开这儿，又上哪儿去呢？哪儿能找碗飯吃呢？我只好忍气吞声在門外跺[duò]脚取暖。过了好久，狗出来撒尿，有人給它開門，我才趁机悄悄溜进屋去。

这給狗開門的事，也是归我做的。每天半夜，狗要拉屎撒尿，我得起来給開門，等它拉完屎撒完尿，才能關門睡覺。

在起发順饅子鋪里，我过的就是这种人不如狗的生活！

1947年底，我来到了河东西順南号豆腐坊。我的工作
是挑水。

每天早晨卖完座，我得把脏水一担一担挑出去倒了，倒完了，紧跟着就挑河水。里里外外一天要挑一百多担水。



每天紧干快干也要工作二十多个钟头。

活儿这样累，柜上又很赚钱，按理说掌柜的应该给工人吃点好饭食了吧？可是，我们吃的是发霉的玉米面掺豆腐渣的臭窝窝。吃着这样的东西，每天爬两三丈高的大堰，挑一百多担水，真是顶不住劲。

腊月里，冰天雪地，像刀子似的北风，一个劲地刮。我身上穿的，还是离开老家的时候那身棉衣，已经破烂得到处看得见那黄黑黄黑的棉絮[xù]，哪能经得住这般寒冷！挣的那点儿工钱，连双棉鞋也买不起。

有一次，我看见河沿上的水管裹了很多破毯[tǎn]子，便撕下两块裹在脚上。我立刻感到十分温暖舒服，心想，这下子脚不会再受罪了。哪知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把包在脚上的破毯子往下一揭，呀，羊毛和冻烂的肉粘在一起了！我咬紧牙，忍住痛把破毯子一片一片扯下来，两只脚血淋淋的也没个好地方了。

脚冻成这样，烂成这样，第二天还是得踩着冰冷的地面去挑水。

我这苦难的徒工生活，直到天津解放才结束。这种充满了血和泪的徒工生活，现在当然是一去不复返了；但是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过去的苦难。想起过去的苦，才能体会今日的甜哪！

天津天聚成豆腐坊经理 多兴云口述
常 义整理

鞋 的 故 事

紡織娘，沒衣裳，
晒鹽的，喝淡湯，
編涼席的睡光炕，
當奶媽的賣兒郎。

這四句話說得千真萬確。解放前，我在一家鞋鋪里當學徒，自己做過成百成千雙鞋，却成年光着腳板沒鞋穿。

1936年，我十五歲，娘托人送我到濟寧一家鞋鋪去學手藝。臨走的時候，娘摸着我自己身上被地主打的傷疤，淌着眼淚說：“孩子，去吧！在家即便餓不死，也免不了叫‘焦扒皮’折騰死。到鞋鋪當學徒，能掙口飯吃，興許還能混上雙鞋穿呢。”我鼻子一酸，涌出兩眶眼淚，生怕娘看見，趕緊低下頭，用腳踢着土，把掉在地上的眼淚蓋起來。

爹活着的時候，給地主“焦扒皮”當長工。他干了不到一年，就活活地累死了。人死了，“焦扒皮”一個工錢也不給，娘好說歹說才向他借了點錢，買了口薄板棺材把爹埋了。後來，娘又到他家去干活頂債，去了不幾天，就累病了。於是又把姐姐賣了，還了地主的債。我從十二歲起，就給地主打短工，成天挨打受罵。除夕那天，地主嫌我活兒干得不好，一頓棍棒把我打出門外。眼看別的活路沒有了，只好听



娘的話，到城里去學手藝。

我到濟寧，一進鞋鋪，老板朱繼和就冷冷地瞅了我一眼，然後就向介紹人說：“咱們有言在先，要學手藝就得守我這裏的規矩；進門打罵由我，期限五年，期滿交三百斤糧，請三桌客。”介紹人按照娘的囑咐都答應了。

朱繼和是個地主兼資本家，又開鞋鋪，又出租田地。他勾結官府，欺壓窮人，當地人都恨他，叫他“地頭蛇”。我一上工，他就逼着我一天納七雙大人鞋底。厚厚的一雙鞋底，要用手一針一針納出來，七雙鞋底要納多少針哪！一天怎麼納得了呢？納不完，他就用帶釘子的鞋底打我。剛去三天，就被他打的滿頭是鼓包。干了好幾天，手指頭叫麻繩“殺”了一道血口，露出了骨頭，痛得難忍的時候，我真想跑回家去扑到娘懷里大哭一場。可是一想到娘還在生病，又只好擦干眼淚干下去。冬天，望着窗外紛紛揚揚的大雪，再瞅瞅自己一雙凍得通紅的光腳，耳旁就響起娘的話：“孩子……到鞋鋪當學徒，興許還能混上雙鞋穿。”想到這裏，兩行熱淚刷地流了下來。我天天做鞋，可是自己的腳卻凍得像個爛地瓜。

一天清早，雪下的正大，“地頭蛇”叫我到十多里外送鞋。我拖着雙半截底的鞋，踏着雪，一步一步地走着，好歹把鞋送到了。可是回來的時候，腳凍僵了，不敢挪步，我只好在雪地上滾一陣，爬一陣，直到掌燈大半天了，才爬到鞋鋪門前。“地頭蛇”見我回來了，拿着帶釘子的鞋楦[xuàn]，氣勢汹汹地踏着門檻[kǎn]罵：“媽的，這時候才回來，還想



等着派轎把你抬回来么？”說完，鞋櫃像雨点一般朝我头上身上打来，最后一脚把我踢倒，“啪”的一声关上了店門。

雪越下越大，夜漆黑漆黑，我到哪里去过夜啊？我爬到了井台边，有心跳下去。就在这一刹

那，我又想起了可怜的娘，想到爹的死，我不能这样白白的死去，便宜了这些杀人不见血的东西！一股勇气支撑着我，从井台爬到避风的墙根，过了一夜。天一亮，我怀着刻骨的仇恨，爬进了鞋鋪。

就这样，我在“地头蛇”朱繼和的鞋鋪里熬到二十岁。五年期滿了，娘托介紹人央求“地头蛇”准我出徒，“地头蛇”一听，皮笑肉不笑地說：“可以，交上三百斤粮食，摆好三桌酒席，就馬上出徒。”这要多少錢啊！我們怎么办得到呢？办不到，我还得給他白干。

又过了三年，我听說家乡微山湖一带鬧起了革命，我心



里真高兴。有一次，我出去送鞋，認識了一个游击队的負責人刘明。他很同情我的遭遇，經常約我深夜在村外一块老坟地会面，給我講共产党領導劳苦大众鬧革命的道理。当年10月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从此我覺得有了靠山，有了主心骨，心里热了，眼睛亮了，身上更有劲。白天干活，晚上就瞞着“地头蛇”到附近的村庄去組織青年抗日先鋒队、“农教会”，宣传党的政策。

1944年10月，革命的风暴席卷了整个微山湖和济宁地区，党調我出来搞革命工作，区政府发給我一套蓝色新制服，还有一双新布鞋。当我双手接过鞋的时候，不觉热泪夺眶而出。我十五岁进鞋鋪做了八年鞋，还没有穿过一双新鞋。是党给了我新鞋穿，新衣穿呀！

这时候，我的家乡实行了土地改革，“焦扒皮”和所有的地主都被打倒了。我家分到四亩地，我娘当了农教会的会长。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呀。

青島四方机車車輛工厂 张绪波

女 工 苦

每回我走过厂里托儿所的門口，或是上班下班看到姐妹們抱着小孩进厂出厂，我就想起解放前在紗厂做工的时候生儿养女的苦楚。

1947年5月，我进了一家紗厂。

那时候，工厂是資本家的，我們工人是資本家的奴隶。資本家为了榨取我們工人的血汗，訂了許許多多狠毒的厂規要我們遵〔zūn〕守。里面有一条就是不准女工把孩子带进厂去喂奶，也不准請假出厂喂。那时候，我的女儿謀珍出生才四个月，沒有奶吃怎么行呢？我着急得不得了。后来姐妹們帮我出了个主意，叫我用衣服把孩子裹着，当做衣服夹进去。

每次进厂的时候，都是姐妹們趁进厂的工人多、拥挤，把我遮住躲过厂門口的巡捕（就是厂警），我才能把孩子带进厂。

在厂里，資本家的狗腿子們，一天到晚在車間里轉游，要是搜出誰帶了孩子，不是罰款、打罵，就是开除。姐妹們又給我出主意，說厕所里臭，狗腿子們不会进去，把孩子放在那里，他們不会知道。我想：厕所里又臭又脏，蒼蝇成群，蛆虫成堆，孩子攔在里面，多受罪！可是不攔在厕所里，又



能攔到哪儿去呢？沒有辦法，我只好到廁所里鋪了一塊席子，把孩子往上面一放，趕緊到車間去。

我心里时时惦记着躺在廁所里的孩子。早該去喂奶了，可是監工的老在跟前，我沒法溜出去。好不容易挨到監工的走開，我奔到廁所里一看，天哪！孩子身上叮滿了蒼蠅，一條條肉滾滾的蛆虫在孩子身上、臉上、脖子上到處爬着！可憐，孩子難過得手腳亂抓亂蹬，哭得聲音都啞了。我心疼得眼淚濼濼地往下掉，恨不得馬上把孩子抱着走開。可是走到哪里去呢？要是給監工的看見了，我的工作就丟了。

我含着眼淚，一面給孩子喂奶，一面把蛆虫一條一條擦掉。孩子受了半天罪，這會兒偎在我懷里，吮着奶頭，甜靜地睡着了。我真想讓她多睡一會兒，又怕耽擱久了，監工的查問。我硬着心腸把奶頭抽出來，把孩子往地上一擱，急忙轉身回到車間。

孩子在廁所里放了個把月，被狗腿子知道了。狗腿子罵着，要我把孩子弄出去，要不就



开除我。

我望着孩子瘦削的小脸，心想，孩子放在跟前，有奶吃还瘦成这个样子，要是弄出去了，没有奶吃，还能活吗？我把心一横：开除就开除，要我把謀珍弄出厂，那是把她往死里送，我决不干！要死，我们母女俩死在一起。后来，我在搜身房旁边找到一个不常有人去的空地方，把孩子放在那里。

有一天，一个姐妹急急忙忙跑来告诉我：“祝生秀，你的娃儿被厂里养的狗拖到路上来了！”我一听，心都要炸了！想跑出去，可是监工的像狼一样站在车子旁边盯住我。我只好装做没事的样子继续干活。一直等到监工的走开，我才抽身赶出车间。一看，孩子躺在地上两腿乱蹬，泥巴、屎、尿糊了一脸一身，可怜她哭得气都喘不过来了。看见孩子这样遭罪，我的心像被刀子搅似的难受。可是，怕巡捕听见，我连哭都不敢哭出声……

这个地方也放不成了，我把孩子用衣服裹着，放在摇纱车间堆烂东西的一个黑房子里。在那里又放了一个多月。这时候，孩子已经满七个月了。厂里狗腿子们查得越来越严，我就和妈商量把孩子放在家里。妈哭着不肯，说孩子体弱多病，不吃奶怕养不活。我对妈说：“孩子在家遭罪还看得到，带到厂里被狗拖走了都不晓得，狗腿子要是查出来，我工也做不成了，大人孩子都得饿死。”就这样，孩子再也没有带进厂了。

这是我们女工在旧社会生儿养女的一段悲痛的往事。



在新社会，党对我们女工照顾得真是周到极了。女工一怀孩子，领导上就给换轻活，生了孩子，有五十六天产假，工厂还办了托儿所、幼儿园，孩子小，放进托儿所，大了，送到幼儿园。女工再也不受生儿养女的苦了。看看今天的幸福生活，比比过去的种种苦难，我永远也忘不了党和毛主席的恩情。

湖北沙市纱厂五好工人 祝生秀

我的遭遇

从前，我家有七口人，孩子他爸爸，我，三个女儿，两个儿子。在万恶的旧社会里，在资本家残酷的剥削压迫下，我家七口人被折磨死了四个，只剩下我和一个儿子、一个女儿。

解放前，孩子他爸爸在一家毛纺织厂看水泵[bèng]，挣的钱不够一家人吃饭。有一天，听说，兴亚钢厂招女工，一天给一斤棒子面。我东托人、西求人，好不容易进了这家工厂。

不论刮大风、下大雪，我每天早上顶着星星上工，晚上顶着月亮回家。那时候，我的大孩子十四岁，小的只有六岁，吃、穿全得他们自己料理。

我和孩子他爸爸两个人干活，按说一家人的生活应该能过得下去了吧，可是，我们还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。资本家说是给棒子面，发下来的却是一些高粱面、山芋干、豆饼、麸[fū]子……孩子们吃了，连屎都拉不出来，憋得呜呜哭，有时候宁愿饿着也不肯吃。

有一次，我买了二分钱豆腐渣，搁点水熬开了，只有半碗多点，孩子们见了，一齐围上来，这个说：“妈，给我喝一口。”那个说：“让我吃一点。”我瞧着一个个脸皮蜡黄的孩



子，又难过又心痛。

吃是这样，住的、穿的就更差了。我們住的那間屋，四面透风，冬天倒碗水在屋里，一会儿就冻了。一到雨天，屋里漏得透湿，孩子大人就一齐往外舀[yǎo]水。炕上連个破席头都沒有，更不用說被子了。冬天沒盖的也沒穿的，睡覺的时候，娘儿几个背靠着背挤在炕上，两个大閩女只有一条破棉褲，这个穿了，那个就穿不上。小的就只穿点破夹袄和破褲子——家里連根布条都难找，哪还有布补。

穷不說，在那黑暗的旧社会里，还常常遭到意想不到的灾祸。孩子他爸爸是个老实人，从来不肯占別人一点便宜。有一天，不知是誰把一丈多呢子、一堆羊毛和一把剪子放在水泵旁边。資本家見了，硬說是他偷的，不問青紅皂白，就把他逮走了。他被打得小襟成了一縷一縷的，昏死过去了，用草紙熏了半天，才醒过来。資本家硬要逼他招認，就派人把他关了起来。

孩子他爸爸被关起来的事，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。他几天沒有回家，哪儿都找遍了，也見不到他的影子。这六口人的担子要我一个人挑，有时候三五天揭不开鍋，心里愁得发麻。

有一天，我心里惦记着孩子在家里挨饿，一沒留神，叫机器把手指上的肉撕下一大块，差点儿伤着骨头，疼得我浑身冒冷汗。工人遭了工伤，資本家不但不給治，要是請假，还要被开除。我怕歇了工，連那一斤“棒子面”也拿不到了，只好忍着鑽心的疼痛去上班，一天工也不敢歇。

还有一次，我发瘧疾，冷得渾身打哆嗦。我实在受不住了，便在車間的洋灰地上找了个地方，想躺下歇会儿。还没躺下呢，狗腿子过来了，二话没说就毒打了我一顿。

我在厂里挨打受气，孩子他爸爸关在牢里受刑罚，孩子們在家里挨饿受冻，这日子哪是人能忍受的啊！

孩子他爸爸一关就是三个多月，回家来只剩了一口气和一把骨头，孩子們見了他，都不敢認了。他渾身烂得没有一点好地方，路也不会走了，是由別人扶着回来的。我一天只掙一斤“棒子面”，飯都吃不上，哪还有錢买药給他治呢。他連病带饿，过了几个月就死了。死的时候，就穿了一条破裤子和一件烂单褂，从他大爷那儿要来一領破席，就这么卷着埋了。

我二女儿那年才十二岁，是个好孩子，跟着爹媽沒过一天好日子。她爸爸沒死的时候，心想叫她去做童养媳，她也許能吃頓飽飯。因此，就托了个媒婆給她找了婆家。那家給了三十块钱，我哭着看婆家把孩子領了去。沒过几天，孩子就跑回来了，說情願在家餓死，也不到別人家去了。

孩子回家几天就得了病，成天泻肚子。眼看她一天天瘦下去，也沒錢給她治，我心里火烧火燎的。她从得病那天起，就口口声声求我給她治，直到临死前一天，她还拉着我的手，对我說：“媽，給我治治吧！”我听了，心里像針扎的一样难受！第二天，我到厂里去，想請假在家照顧她，資本家的狗腿子却說：“不准！孩子生病有什么了不起的！”

沒有办法，我只得照常上班。可是，我哪里能安心呢！



盼啊，盼啊，好不容易盼到下班的汽笛响了，我赶忙拿起向人家要来的两个窝窝头往家跑。进屋一看，孩子早断气了！我哭，我喊，可她再也听不见妈妈的呼唤了。

第二年三月十四日，我那二儿子因为抗不住饿，也死在炕上。又过了两个月，我那小女儿出疹子，受了风，没钱买药治，几天以后，也死去了。

不到两年，我一家人接二连三地死了四个！要不解放，我和我那大儿子、大女儿也活不长啊！

现在好了！不愁吃，不愁穿，称心如意地过日子。我的儿子在毛纺织厂做工，女儿、女婿也都有工作。一想到过去的遭遇，我就更热爱今天的新社会了。

天津钢厂钢丝绳厂女工 张绍琴



在資本家的笑臉後面

天下沒有不吃羊的狼，世上沒有不剝削工人的資本家。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手段不僅很毒辣，也很狡猾。有時候，他們像童話里的“狼外婆”，把自己打扮成一個“善人”，用小恩小惠來欺騙工人。為了揭露資本家的這種偽善的面貌，我特地訪問了一位姓何的同志。他給我講了解放前他受資本家的欺騙和蒙蔽的故事。

我十三歲上，爸爸失業了，家里窮得連飯都吃不上。實在沒有法兒了，爸爸只好領我到一家木匠鋪去當學徒，讓我自個兒掙飯吃去。

木匠鋪的宋掌櫃和我家是老鄰居，平時管我爸爸叫三叔。得虧有這點關係，他才“破格”收了我這個十三歲的童工。這麼一來，就把我們胡弄住了，讓人家剝削得三根腸子閑着两根半，還好像總也報答不盡人家的恩情似的。

進鋪子的頭一天，宋掌櫃看我又瘦又小，顯出為難的樣子對我爸爸說：“三叔，你把孩子領回去吧。太小了，當學徒都得十五六歲才行哪。”

是啊！是太小了。今天十三歲的孩子，正是系着紅領巾，活蹦亂跳上學的時候。可是在舊社會，窮人家的孩子在



家里就得餓死。我爹哀求宋掌柜說：

“你权当养个小猫小狗，給喂几年吧！”

好說歹說，宋掌柜才把我收下了。說好別人当学徒三年給七十五吊錢，我太小只給七十吊（从前用銅錢，一千个銅錢叫一吊）。可是講干活，因为我是最小的徒弟，只能多干，不能少干。就这样，我爸爸还觉得宋掌柜人好，对他千恩万謝的哪！

学徒学徒，三年为奴。我和师兄弟們天天都是十一点多鐘睡覺，三点左右就得起来。做夜工的时候，睡的还要晚。学徒都是些半大孩子，能不困嗎？有一天早晨，我們收拾刨花。干着干着困了，就睡在刨花堆里了。宋掌柜早晨起来到处找不到我們，一脚从刨花堆里踢出一堆徒弟。他罵了一句，“跑他媽这儿来睡回龙觉了，給我干活去！”

这一次，宋掌柜給我們留下了个好印象。他虽然罵了我們一句，却一下也沒打，这掌柜的多好呀。大家就像贖罪似的狠命地替他干活。

至于我呢，更觉得宋掌柜好了。有一回，我拎着油瓶去打油。走在大街上，看見拐角有个說書的。我想凑上去听听再走，一听就出了神，忘了去打油。冷不防，后边有人輕輕地踢我一脚，把我吓了一跳。拎瓶子的手一松，油瓶打了个稀烂。我回头一看，是宋掌柜。他看我打碎了油瓶，一声沒吱就走了。他又沒打我，我感激的不知說啥好了。

那时候，做夜工是干三宿歇一夜。学徒的盼星星盼月亮，好容易熬到这一个歇工的夜晚。可到了这天夜里，柜上

就来收拾徒弟了。三天来誰有什么过错，一块儿算总账，重的打板子，輕的罰跪。这天黑夜，我师傅叫我趴在炕沿上，大板子一下接一下地往屁股上打。边打边問：“往后还睡不睡回龙觉了？”“上街还听不听書了？”咬牙切齿地罵我没志气。打完了，罵完了，还讓我們排一溜儿跪在魯班像前。也不知道跪多半天了，可巧一个大师傅来了，他进门的时候沒看見黑影里跪着一溜徒弟。一迈进門槛，就讓我給絆了一个趔趄[liè qū]。他吃惊地說：“哎呀！这儿还有人？”

他去找宋掌柜給講情，宋掌柜嘻皮笑脸地走来“圓場”（就是給調解），讓我們給师傅們裝烟、倒水、作揖、行礼，算是賠礼道歉，这才完事。这时候，也就折騰到小半夜了。

折騰来折騰去，在我們的小心眼里，恨的是师傅，宋掌柜却成了“天下第一大好人”。可是，后来我們大了一点才知道，这个鋪子有个規矩：干活的时候不許打徒弟（怕耽誤活），但是只要掌柜的跟师傅說一声哪个徒弟該管教，师傅必須在歇工的夜晚打他，誰要是不打就是违犯鋪規。是啊！掌柜的不告訴，师傅怎么会知道我睡过回龙觉、听过書？有人替他打，他还亲自劳神費力干啥？我这才初步認識了掌柜的真面目。怪不得师傅每回打我，他都好像自己挨打一样，难过的几天也变不过脸色来。

唉！不管怎么的，将就学下去吧，好在三年快熬到头了。

三年滿了，我去找宋掌柜，請求讓我出徒。他說：“出徒？你去問問賬房吧。”



賬房會計說：“櫃上的規矩，年節放假，病假事假欠的工都得補上，干足三十六個月才能出徒。再說，現在還沒到節令。你再干幾個月，到年底才能出徒。”

補就補，我一咬牙又白給他干到了年底。我們一塊兒出徒四個，那三個都走了。那時候，我的手藝在櫃上已是數一數二的了。宋掌櫃把我找到後屋，對我說：

“二弟！（三年來他第一次叫我二弟）你別看他們都走了，那種人到哪兒也干不長。……眼下你有什么困難沒有？”

“有，困難有的是。你看我這一身穿戴，一點棉花沒有，破破爛爛穿了七年了。再說家里要吃沒吃，要錢沒錢……”

“那好辦，兄弟。先從櫃上支點工錢吧，給你記下賬，以後從你的工錢里扣。”

宋掌櫃和我當場講好，我的月薪是七十吊錢。學徒三年才七十吊，這回一個月就給七十吊，還先給我支工錢，我知足了，高興的要命。我覺得天底下再也沒有比他好的掌櫃了。可是，誰料想，這下可是家雀吃了探頭食，讓人家給抓住了。只這一條就壓得我伏伏貼貼地給他賣命干活。後來聽說那三個師兄弟出去，掙的錢都比我多。這時候，我想走也走不脫了，上哪兒弄錢來還借支的工錢哪？

沒關係，我豁出省吃儉用熬上幾年，不信就還不清賬。我這麼下了決心，狠干了幾年，眼看借支的錢快還清了，偏赶上我爺爺死了。又得去找掌櫃的。

一個伙友替我去跟宋掌櫃說：“何師傅的爺爺死了，給拉口棺材去吧！”

好說歹說，宋掌柜才答应給拉口薄板棺材，花多少錢，給我記下賬。这种棺材是最薄的了。可是，他却說：“这比慈善会給的强多了。錢还說不上哪百年还得上，这錢要放在柜上，一天就能翻几个个儿。”

当我面他不这么說，他拍着我的肩膀說：“咱們不是外人，你好好干，亏不着你。从下月起給你加两个工錢。”

我心里明白，外边工錢都加了，連他的亲侄子都不在他这儿干，跑大厂去了。他怕我跑，才給我加了这两个錢，就这样，比外边最低的工錢还低得多。可是，当时我还是想，人家在咱为难的时候帮过忙，好歹总算給加了两个，少掙点就少掙点，对付着干下去吧。我还是那样不顧死活地干。

但是，接着，娶老婆、生孩子，接二連三，家里出点事就得到柜上借錢，旧賬沒还清，新賬又欠下，年年結賬都有亏欠。

說借支，你以为什么时候都可以借支嗎？不是的。那要看掌柜的需要不需要。比方說，眼看你欠的賬快还清了，看你有走的可能了，这时候，你不张嘴，他也会来献殷勤借給你，好攏住你；若是看你欠的錢一时半晌还不清，你走不了，就是你有天大的困难，他也不管。

有一年，快过年了。我老婆領着孩子，从乡下到城里来，手里拿着一个啤酒瓶子。她跟我說：

“快过年了，家里有老的又有小的，能不能借点錢打一斤豆油家去？”

我說我去跟掌柜的說說，再支点錢。宋掌柜到賬房看看我欠的賬一时还不清，就說：



“你年年总是欠钱，哪百年还清啊？一个油，不吃还不行？还钱可得你自个儿想法子啊！”冷嘲热讽，把我气的说：“对！不应该吃油。”说完，我从老婆手里夺过瓶子，顺手从窗户眼儿摔到街上，摔了个粉碎。老婆孩子又害怕又难过，抱头啼哭着回去了。



就凭我这“拔尖”的手艺，没年没节拚命地干，连个家都养不起。而掌柜的却是越养越肥，在城里，他盖房子开铺子，一个院套又一个院套，一个分店又一个分店；在乡下，他接二连三地买地，一垧（一垧是十五亩）一垧又一垧……最后，他关掉木匠铺做别的买卖，用不着我们了，就把我们都解雇了。我正当年轻力壮就失了业。

直到解放后，我才明白，原来宋掌柜表面上对我那么“关怀”，正是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手腕。可是，那时候，我却叫他的笑脸给蒙蔽住了，把这个笑面虎，当成“天下第一好人”。

纪 哲

一个电工的惨死

1921年深冬的一天早晨，杭州大有利电灯公司的工人王增冠、俞良正，冒着像尖刀一样的西北风去上班。他们穿着又薄又破的衣裳，冻得手脚麻木，嘴唇开裂。

一进厂门，就碰上了领班的工头。这家伙，是资本家俞丹屏的忠实走狗。他天不亮就一边烤着火，一边等人了。

王增冠、俞良正手脚还没有暖和，领班工头就派给他们两个人两天才能做完的活，催着他们上班。还警告说：

“要是今天偷懒做不完，回来当心饭碗！”

王增冠、俞良正说：“活儿太多，一天恐怕做不完。”工头眼睛一瞪说：“为啥不早点来？少磨牙，快去！”

天刚发白，没到上工时间就进了厂门，工头还说来晚了！刀把子攥在人家手里，和他到哪里讲理去？两人只好忍气吞声地去卖命干活。

他们穿街、过巷，一根一根地检查电杆电线。天不亮喝的两碗稀薄的六谷（就是玉米）糊糊，早已消化掉了。肚子里空空的，身上穿的又单薄，饥饿、寒冷、疲倦一齐向他们袭来。想回去吃点东西再干吧，一家老小的晚饭，还等着他们领到工钱回去，才能买米煮呢！哪里有东西吃？再说，还有好几家用户的电线没有接上，回去怎么向工头交差呢！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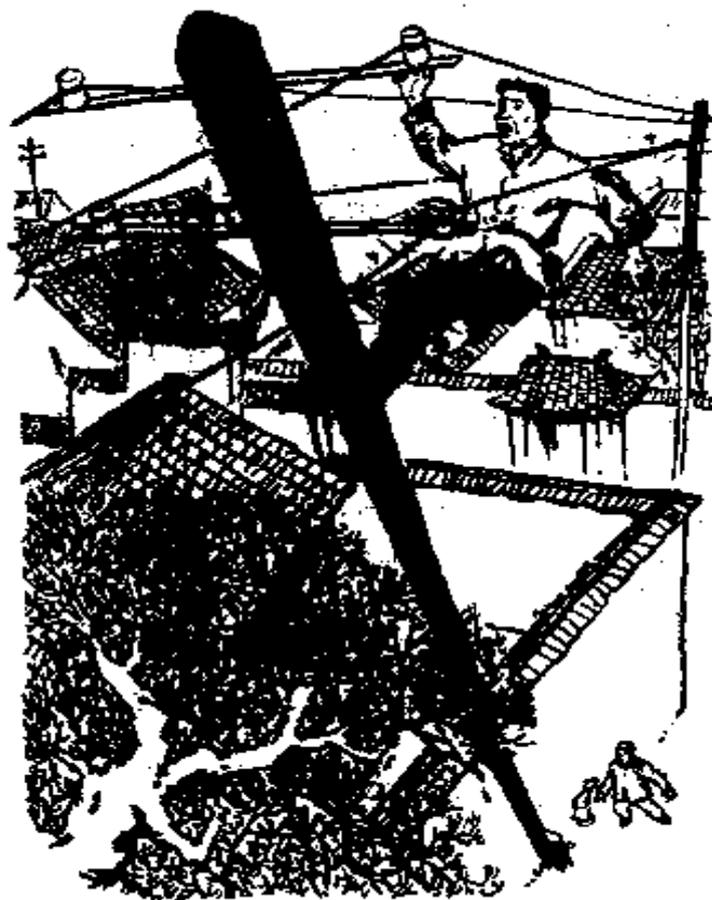


想到厂里动不动就减人，他俩只好勒紧裤腰带，拖着沉重的脚步，继续干。

小火把弄(一条街名)有根电杆，将近四丈高。两个人抬头一看，不由得倒抽了口冷气，这么高，又没有保护安全的皮带，怎么上去做活儿呢？就这么爬上去吧，要是手一松，掉下来就没命了！不干吧，回去一定会砸破饭碗的。两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为了一家大小能喝口稀汤，王增冠只好硬着头皮上去了。

饥饿，使他无力往上爬；寒冷，使他手脚不灵活。还没爬到电杆半腰，他就爬不动了，只好抱住电杆，闭着眼睛歇一会儿，再挣扎着向杆顶爬。

歇歇爬爬，爬爬歇歇，好不容易才爬到电杆顶。他稍稍歇了一会儿，用两条腿夹住电杆，松开右手去接电线。靠两条腿这么夹住，能支持多久呢，再说，跑了这半天，肚子里早已没有一点东西，能有多少力气呢！他接



了一会儿，突然身子一歪，头朝下从杆顶猛摔下来……

俞良正在下面只听得“啊呀”一声，定睛一看，王增冠已经七孔流血，直挺挺地躺在石板地上，不省人事了。俞良正呼天唤地扑上去摸他的胸口，还有点热气，赶紧叫来一部人力车，把他背上去，往电灯公司拉。

血，王增冠眼睛、鼻子、嘴巴里流出来的血，随着人力车的震动，滴了一路，把一条青石板路滴成了一条斑斑点点的血路！

车子拉到电灯公司门口，资本家俞丹屏正坐着轿子，前呼后拥地出来。俞丹屏听见门口人声喧嚷，就命令随从人员说：“新年新岁的，咦嘿哇啦像啥体统。去看看他们在干什么！”

资本家的爪牙推开众人上前一看，忙掏出手帕捂住鼻子，赶紧退到轿子跟前，恭恭敬敬地报告：“俞经理，一个工人闯了祸，从电杆上摔下来，七孔流血。……”

俞丹屏淡淡地说：“何必大惊小怪！去找管事的，不要耽误我会餐吃酒。”他吆喝着催轿夫赶快上路。俞良正见俞丹屏就要溜跑，赶紧和几个工人一起围上去拉住轿子，要求把王增冠送医院抢救。

俞丹屏见工人们拦住去路，只得从轿子里探出半个脑袋，朝人力车上的“血人”瞥了一眼，皱着眉头不耐烦地说：“人快完了，送医院也没用。把他抬回他家里再讲！”说罢，长袍袖子一甩[shuāi]，连连地催轿夫走。

轿子前面有一批狗腿子卫护着，工人没法儿挤上去。

就这样，俞丹屏坐着轎子，沿着王增冠滴了斑斑鮮血的大路，悠閑[yōu xián]自在地會餐吃酒去了。

工人們眼看着資本家見死不救，个个恨得咬牙切齒；他們不忍心看着自己的窮兄弟就这样死去，俞良正和工友們一合計，說：“送回家去就等于送死，送到醫院去救活了再說！”說着，大家便飞快地把王增冠往醫院送。可是，因為傷勢太重，流血過多，在半路上王增冠就斷了氣。

大伙兒把王增冠的屍體抬回家裏，他妻子像當頭遭到一個悶雷，一聲慘叫，撲上去抱住丈夫的屍體，立刻哭昏過去。三個苦命的孩子，也抱住爸爸的手腳，一聲聲悲慘地哭叫。工友們、鄰居們見了，都傷心地流眼淚。

大家推醒王增冠的妻子，含着眼淚勸慰她：“增冠嫂，人死不能復生，想辦法料理後事要緊。”她越哭越傷心，哽哽咽咽地說：“眼下連晚飯米還沒着落，哪有錢買棺材呀！”

俞良正心裏又是悲痛，又是氣憤，他對大伙兒說：“我們找資本家說理，要求公司發給安葬費和家屬撫恤[xù]金！”

“對，找老板去！”大家覺得這是個辦法，便攙着她，順着那條血路，到公司去找資本家。

來到公司門口，一見丈夫的那灘血，她禁不住又放聲痛哭起來。

見死不救、去飯館大吃大喝的俞丹屏還沒有回來。天，眼看就要黑下來；屍體，還直挺挺地擱在家裏。怎麼辦呢？王增冠的妻子抽抽噎噎地哭着，人們都憤憤不平地罵資本家是沒有心肝的豺狼。



这时候，领班的狗腿子出来了，工友们上去对他說：“领班先生，你向俞經理說句話，給王增冠家里发点安葬費和家屬撫恤金吧！”狗領班冷笑着說：“笑話！这是他自己不当心跌死的，跟公司有啥关系？”

俞良正一听，牙齿咬得格格响，

冲到狗腿子面前大声反駁道：“你不要睁着眼睛說瞎話！公司沒发护身皮帶，你又把两个人两天才能做完的活派給王增冠和我。他吃不消了才跌死的，怎么能說跟公司沒有关系？”

狗腿子被問得一句話也答不出，索性耍起蛮橫来，他一把抓住俞良正的衣領，恶狠狠地說：“胆子倒不小！这里是啥地方，輪得着你說話！滾开！”說着，把俞良正一推，又指着他說：“我本来还要找你算賬！你今天的活做完啦！哼！不想想自己的飯碗，还敢来这里胡鬧！”

王增冠的妻子又上前去，向狗腿子央求。那家伙更气

势汹汹地大叫道：“俞經理关照过，公司概不負責！不要再囉嗦了，电灯公司又不是棺材店！滾开，統統滾开！”

資本家有錢有勢，窮人有苦无处訴，有冤沒处伸！后来，还是工友們和左邻右舍，东拼西湊地給买了口薄板棺材，才把王增冠的尸首埋了。

就在王增冠惨死的第二天，資本家又玩出一套鬼把戏，用什么“失职誤伤工友”的罪名，把俞良正一脚踢出了厂門。

王增冠的妻子沒法生活，不得不拖着三个孩子沿街討飯。由于过度的悲痛和气憤，沒几天，她就死在她丈夫洒过鮮血的路旁。三个孤苦伶仃的孩子，成天在街头流浪。

唐殿元

十四条人命

1948年农历8月15日，湘潭永安石膏矿的资本家在那里大摆筵席，欢度中秋节，我们工人却正侧卧在井下小巷里，一锤一锤地打石膏。饥饿、疲劳、污浊的空气，折磨着我们。

忽然“嘩啦！”一声巨响，一股寒风像刀一般削过来，紧跟着，汹涌澎湃的洪水涌进矿井。大伙儿乱跑乱撞，跑得慢一点的，就被洪水吞噬(shi)了。最后，剩下我们四十多个，挤在一处不到一方丈的巷头。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水从腿边涌到肚子、涌到胸口、涌到肩头，都吓呆了。

不知谁凄惨地叫了一声娘，打破了死一样的寂静，接着叫娘的，喊救命的，乱成一片。有个工友切齿大罵：“资本家杀人不見血，一个月以前，我们就看到矿壁发潮，知道要穿水，几次报告工头、經理，这些狗杂种反說我们造謠。要是人死了真有鬼魂，我非把他们掐死不可！”

话音刚落，忽然响起一片矿井坍塌的声音，有經驗的工友断定：“水在退！”大家見有了一线生机，便手拉手地挨着往外摸，摸过一段水巷，前面又被洪水阻住了。我和老工人彭連和赶到前面去探路，摸进一条巷子，老彭手一甩說：“你等等，讓我一个人去！”巷子里黑古隆冬，什么都看不見，他



刚下水往前走了几步，只听见“咕噜”、“咕噜”几声，再也没有声音了。我心像刀绞一样，怔了一阵，便自己下水去摸。刚下去，几个死尸同时被水冲了过来。我顾不得这些，从水里泅过去，使尽力气叫喊：“救命呀！”



水继续在退，没淹死的工人兄弟，都挤过来了。开始，大家还轮流喊叫：“救命！”但是喊了很久，除了回声以外，什么声音也没有。有经验的老工人说，准是狼心狗肺的资本家把井口给封了。不知又熬过了多少时候，我们听到外面仿佛有人声，就一齐喊了一声：“救命呵！”

地面上的工人兄弟听到了喊声，急忙把封闭的井口打开，把我们吊到地面上来。这时候已经是第三天的深夜了。

后来一打听，果然是涨水以后，资本家怕洪水把其他矿井淹掉，便把井口封了。是工人兄弟和资本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，才硬把井口打开的。

这次事故，我们死了十四个工人弟兄。我侥幸逃了出

来,当时发誓說:就是餓死,也永世不干打石膏的活儿了。

可是,过了二十多天,我又离开妻子儿女,到矿上去干活了。因为在那个人吃人的旧社会,我們工人不卖命,又怎么能活下去呢?

何福仁 口述

王友仁 整理



不同的晚年

我是杭州第一棉紡織印染廠的工人，現在退休了，按月在廠里領養老金，愉快地度着晚年。

可是，我爹的晚年，就是另一個樣子。他給資本家當了五十多年牛馬，到年老有病了，被資本家一脚踢出工廠，落得個貧病而死的悲慘下場。

我爹八歲就当童工。資本家只顧自己賺錢，從來不管工人的健康。我爹小小年紀，沒日沒夜地蹲[dūn]在灰絮叢叢的車間里干活，四十多歲就得了嚴重的气喘病。晚上，我睡在隔壁房裡，只聽得他一聲聲像敲破竹管一樣的咳嗽聲。哪怕是咳一整夜，咳出了血，第二天一早，他也得強打起精神到廠里去做工。那時候是做一天工得一天工資，歇一天就得餓肚子。我爹病得那麼厲害也不敢請一天假。他就这样帶着病給資本家干活，一直拖了二十多年，到六十多歲，又得了尿頻症。

得了尿頻症，少不得要多尿几泡尿。資本家就嫌他干活少了，有一天把他叫到賬房間，要回報他（就是要把他解雇）。同車間的工友們知道了，都气得嚷了起來。這個說：“這麼大年紀了，叫他走，明明就是叫他出去餓死！”那個說：“他像牛馬一樣在廠里做了一輩子工，現在年老體弱了，就

不要他了，資本家太狠心了！”

当时我爹在粗紗車間当机匠，我也在这个車間做工。挡車女工阿三娘听到这消息，就和姐妹們向工头提出抗議。大家都沒有心思做工了，全車間都憤憤不平地議論开了。那些賊头狗腦的工头一看苗头不对，慌忙去报告資本家。資本家生怕事情鬧大，只好暂时把我爹留下来。

过了几天，資本家使了个恶毒的手段，把我爹調去措[kāi]車。这活儿要爬起蹲倒，很累。資本家嘴上說是我爹人老眼花，修理机器不方便，为了“照顧”他，才把他調去措車的。实际上是故意給我爹做重活，好叫他做不了自己走。

我爹干了几天，累得直冒冷汗。他又有尿頻症，有时尿急了，見工头在背后督工，連尿也不敢去撒，生怕工头說他老，不中用。晚上一进家門，他倒在草席上就哼起来：“这些賊胚[pēi]，杀人不用刀！我实在干不下去啦！”

我爹这样又累又气地干了两个多月，被折磨得气衰力尽了。一天，大伙儿正专心专意地在干活，我爹像醉汉似的，踉踉跄跄(liàngliàng qiàngqiàng)走到阿三娘旁边，声音哽咽，断断续续地說：“我……被回报了，回报了！”女工們要再去向工头提出抗議，我爹痛苦地摆了摆手，說：“不用要求了，在这里，也是死。”他在車間里慢慢地走了一圈，两眼噙着泪花望着他修理了几十年的机器，突然扭轉身，提着洋鉄飯罐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紗厂……。

我爹回到家里就病倒了。当时我弟弟还小，在外面做

小販。國民黨的鈔票又不值錢，米價一天漲好些。弟弟的生意不好做，我在廠里得那點兒工錢，連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飽，我們哪有錢給爹治病呢？我和弟弟只有忍飢挨餓，弄點稀粥給爹喝，好讓他多活幾天。



一天，爹把我和弟弟叫到床前，用手撫摸着弟弟的頭，又緊緊地抓住我的手。沉默了好一會兒，他才說：“你們……不用管我了。”我和弟弟都哭了。爹卻沒有哭。他的眼淚早已流干了！

就在第二天下午，我正在廠里做工，忽然鄰居托人帶口信來說：“你爹不行了，你趕快回去！”我想馬上跑回去，可又不敢請假。我含着眼淚做到天黑，一下工拔腿就往家跑。等我趕到家里，見弟弟正在哭，一張黃燒紙已經蓋在我爹的臉上……

我爹死了。他當牛當馬給資本家干了一輩子活，老了卻被資本家一脚踢開，在飢寒貧困中死了。他的一生是悲

惨的,他的晚年更加悲惨。资本家是多么狠毒啊!

现在,我也到了晚年。我生活得这么好!一个在旧社会,一个在新社会,同样是晚年,就有这样大的不同。

周阿巧

王子哲的发家史

王子哲原来是一个只有三百块本钱的小商贩，后来成了有百万家财的大资本家。这百万家财，他是怎么弄来的呢？

王子哲十八岁的时候，跟着他叔叔在农村赶集、上庙会卖杂货，学会了一套贱买贵卖、投机取巧的赚钱的手段。

有一次，他看见卖铁丝筛[shāi]子的生意特别好，一打听，这买卖比卖杂货还赚钱，而且要不了多少本钱，就凑了些钱，买好铁丝，雇了十五个小学徒，开了个编筛子的小工场。

学徒编了筛子，他叫人拿到市上去卖，一个筛子可以卖一块四角钱。一个筛子要花多少本钱呢？铁丝和学徒的饭钱算在一起，只要七八角钱。这就是说，卖掉一只筛子，可以赚六七角钱。按理说，这六七角钱是学徒的手工钱，应该全给学徒。但是王子哲只给学徒一角钱，其余的全叫他吞了。短短三年工夫，王子哲就从十五个学徒身上剥削了四千多块钱！

他拿这四千多块钱，租了四间店堂、二亩场地、十四间房，买了三台机器，又招了三十多个学徒，把原先的小工场改成了筛子工厂。

买卖做大了,王子哲剝削徒工的手段也更毒辣了。原先一个徒工一天編两个篩子,这时候他硬給加了一倍,要編四个。徒工們低着头、拱着背不停地編,每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。他成天在徒工中間轉游,見誰做得慢一点,动手就打。有个叫刘大来的学徒,常常挨打挨罵。他实在忍受不了,有一天偷偷地拿編篩子的鉄絲上吊自杀,幸亏伙伴們看見,才把他救下来。还有一个叫杜明生的学徒,因为疲劳过度,有一天干着干着,一下倒在机器上,被机器活活地軋[zhǎ]死了。

工人这样劳累,王子哲还不满足。他訂了許多条苛刻的厂規,簡直把工人当犯人一样看待,工人平日不能离开工厂,洗澡、理发,要由工头押[yā]着去;做工的时候不准說



話;家里有人来找,不准接进厂里来。工厂大門上有一个四寸大的方洞,工人家里有人来看望,只能隔着方洞說話,而且只准說短短一会儿工夫。不是停工休息的日子,不准請假回家。有个姓洪的徒工,母亲病重,他要回家去看看,王子哲硬不准

請假。后来，这个徒工的母亲死了，王子哲还是不准他回家。这个徒工又悲伤又气愤，受了刺激，得了病，精神有点恍惚。有一次，他在晒台上一脚踩了个空，活活地摔死了。



王子哲这样不顧工人的死活，残酷地剝削工人、压迫工人，工人当然要起来斗争。王子哲先是勾結当地的流氓地痞，后来又勾結日本鬼子来镇压工人的反抗。他为了討好日本鬼子，特地买了一套日本式家具，专门用来接待日本鬼子。他还打扮成日本人的样子，表示和日本鬼子亲近。王子哲投靠日本鬼子以后，更加残酷地欺压工人。有一次，工头把一个叫刘四喜的徒工打得昏死过去，工人一起罢工抗議。王子哲恶狠狠地指着工人们喊道：“你们不干，我给警察局打个电话，要你们的命！……”

日本鬼子投降以后，王子哲又和国民党特务勾結上了，摇身一变，成了国民党的区代表，腰里經常别着手枪，威吓工人。工人一起来和他斗争，他就把国民党特务、恶霸流氓叫来抓工人。

工人们成天像牛马一样地劳累，仍然吃不饱穿不暖。王子哲的钱却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多。几年以后，他拿从工人身上榨取的血汗钱，在天津又开了两个工厂，买了一百多间房屋，还在好几个工厂、店铺里入了股金，成了一个有百万财产的资本家。

王子哲的发家史，就是这么血淋淋的。他的百万财产，每一块钱都浸透了工人的血汗呀！

霍 斌



苦难中的斗争

杭州通益公纱厂的老板高懿〔yì〕臣原来是个残害农民的大地主。当了资本家以后，他又千方百计剥削和迫害我们工人。他只愿赚钱，不顾工人的生命安全，车间里连起码的安全设备也没有。工人劳动的时候，常常被机器轧伤，有的还丧了性命。

有一回，童工叶阿法的手指被机器轧伤了，工头硬说是挡车工王阿毛的过错，便把王阿毛吊起来毒打。一连打断了三根竹扫帚柄，他还不肯住手。过不多久，王阿毛的未婚妻车杏英又遭了大难。一天上午，车杏英正在做工，刚一转身，头发给飞快转动着的皮带缠〔chán〕住了，人马上就要被卷进机器里去。幸亏姐妹们赶紧刹〔shā〕住车，杏英才脱险。车子停了，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她扶起来，一看她头上，连头发带头皮，被撕掉了一大块！资本家高懿臣见她受了伤，一时不能干活，找了个岔子，把她开除了。车杏英没钱医治，伤处化了脓，生了蛆！越烂越厉害，拖了将近一年，活活地烂死了。

有一天，机匠寿阿五的手被机器轧伤，鲜血直流。资本家高懿臣见了，不但不给治，还反咬他一口：“哼，自己的手都这样不小心，我的东西不知叫你糟蹋了多少！”

这个狠毒的资本家还常常不按时发工钱。我们全厂六百多男女工人，都是靠几个工钱过活的，哪里经得起他这么拖！有一回，我们再也等不得了，就推了二十多个代表，由范阿龙、严阿昌带领，去向资本家交涉。谁知道高懿臣不但不答应立刻发下来，还拍桌大骂。代表们火了，也当面痛骂了他一顿。

过了三天，工钱还是没有发。我们气极了，决定马上罢工。这是我们厂里开工以来第一次罢工。大伙儿团结得紧紧的，资本家不发工钱，我们决不复工！接连罢工四天，资本家见再不开工，损失太大，只好赶紧发下来。这是我们和资本家斗争的第一次胜利！

资本家狠毒，资本家的狗腿子工头也狠毒。厂里有个恶工头绰号叫汪癞痢，是高懿臣的忠实走狗。这家伙一副三角眼，满脸横肉，手里成天拿着皮鞭，恶狠狠地监视着工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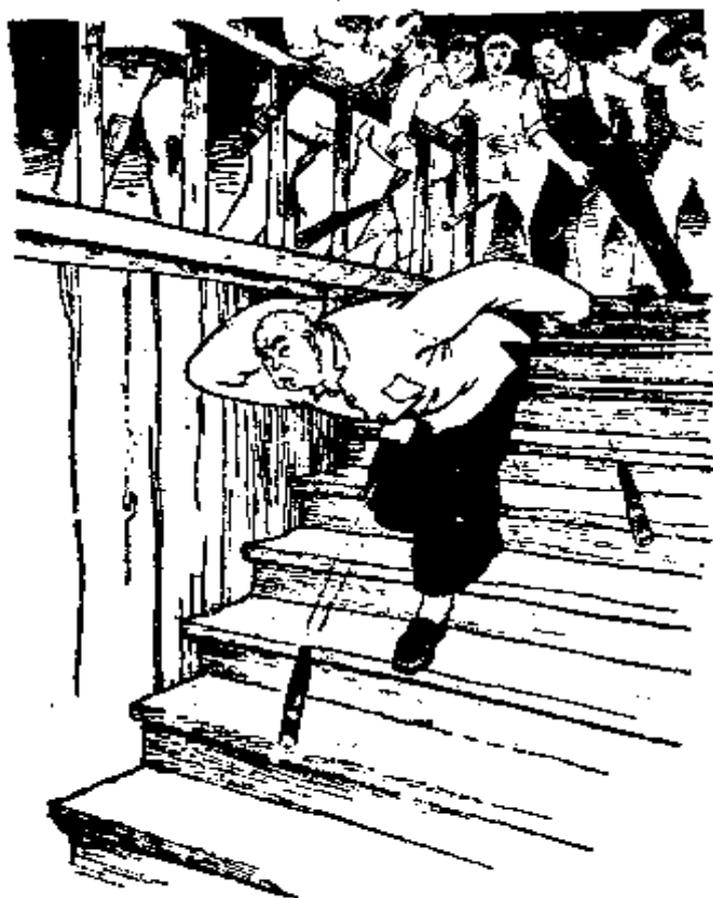
汪癞痢动不动就处罚工人，不是罚款扣工钱，就是打骂。有个女工和别人说了几句笑话，他看见了，就罚了她五角钱。有个男工，在厕所里抽了一支烟，他看见了，罚了一块钱。1918年冬天，一个女工脚上生了冻疮，脚跟不好落地，搽了点烂棉花垫垫脚。不料被汪癞痢看见了，他抬起手，就“啪啪”打了那女工两个耳光。那女工忍住心头怒火，和他评理说：“汪先生，我这不是偷的……”汪癞痢不等她说完，三角眼一瞪，说：“你还敢嘴硬！”说着提起皮鞭就往她身上猛抽，打得她满身一条条血痕，倒在地上打滚。汪癞痢还朝



她身上狠狠地踢了一脚，喝道：“滾出去！”

工人們看在眼里，恨在心里，便商量好，要好好教訓他一頓。

晚上，汪癩痢神气活現地走进了細紗車間。一个把风的工人打了个暗号，几个工人一齐动手，把門窗統統关上。汪癩痢“蹬



蹬蹬”上了樓梯，還沒來得及抬頭，“呼”的一聲，一个細紗筒管打中了他的癩痢頭。汪癩痢正想開口大罵，不料筒管从四面八方飛來。他一看勢頭不好，抱住頭就往樓下跑。哪曉得樓下的工人早已准备好棍棒等着他了。这家伙被打得哇哇直叫，到处乱鑽。有一扇廁所的門沒有關，他慌忙鑽了進去。廁所里正好有两个女工，她們見汪癩痢撞了進來，端起一只馬桶，拋了過去，正好扣在汪癩痢頭上。

奴才遭到痛打，主子自然要替他撐腰。第二天一早，高懿臣就召集工人“訓話”。他恐嚇大家說：“你們的胆子真不小哇，昨天哪个打了汪先生，老实招來！……”他的話還沒

說完，工人們就齊聲回答：“是我打的！是我打的！”高懿臣怕事情鬧大了不好收場，便裝模作樣地“訓”了幾句，給自己找了個台階，走了。

從這以後，有一段時間，汪癩痢和別的惡工頭表面上稍為老實了一點，可是過不多久，他們就更加凶惡起來。我們工人受的苦難，也就越來越多，越來越重。那年月，刀把子抓在人家手里，再說，那還在1921年以前，那時候我們中國的工人階級還沒有自己的先鋒隊共產黨來領導啊。以後，在苦難中經過一次又一次的鬥爭，我們才逐漸地明白，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，大家團結起來鬧革命，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，鏟除萬惡的階級剝削制度，我們工人和所有的勞動人民才能真正獲得解放。

根據杭州第一棉紡織印染廠老工人座談會記錄整理